

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1990—2018）^{*}

——时期与世代效应

权小娟 郑明珠 宋希斌 缪晓雷

摘要：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1990—2018年，青年国家认同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2012年后青年国家认同明显提高。第二，改革开放一代和新生代青年的国家认同并未出现显著下降，而是呈曲折上升的趋势。第三，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认同的式微，且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相比，国家绩效论更能解释青年国家认同的代际差异。

关键词：爱国主义 国家自豪感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全球化 互联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国家认同对社会和谐发展和民族兴旺具有重要作用（李崇富，2013），其中，青年的国家认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和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

^{*}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安交通大学）专项研究课题“西部高校港澳台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XJTUSZ2022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边燕杰教授、梁玉成教授和朱晓文教授在理论和数据分析方面给予了专业意见和建议，特致谢忱。文责自负。本文通信作者为缪晓雷（Email: xiaolei@xjtu.edu.cn）。

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中，但也更容易受到外部信息与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

回顾已有研究，青年国家认同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既有研究特别关注大学生与少数民族青年的国家认同（吕催芳，2021；吕芳，2010）。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性视角、结构性视角和文化性视角（刘佳静等，2023；刘森林，2017）。近年来，个别研究已经对青年国家认同的时期与代际变化趋势进行了考察（陈国华，2023），但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目前还缺乏能够在更广阔社会情境与更长历史时期内反映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分析。此外，对于一些不同的研究发现与结论，我们还难以评判。例如，李春玲和刘森林（2018）的研究发现，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人。而陈国华（2023）基于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却得出了与之相悖的结论，即从2013年到2021年青年国家认同大幅提升，且代际弱化效应不复存在。认识和理解这种矛盾与不一致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要将青年国家认同变迁分析嵌入宏观社会经济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趋现代化。另一方面，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局面，价值危机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日益增多（高海燕等，2022）。青年的国家认同如何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演进，是本文要回答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以及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转型期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表现为上升还是下降？第二，在重大社会政策变革与历史事件的影响下不同世代的青年国家认同如何变化？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是否更弱？第三，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还是国家绩效论更能有效解释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研究，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青年国家认同的变化趋势。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跨度近三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并选择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简称APC模型），由于APC模型的估计方法存在争议，本文将综合使用内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简称IE）和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法（Hierarchical APC—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 简称 HAPC), 以便得到更为真实与可靠的估计结果。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国家认同变迁的理论解释

国家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很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 尝试对国家认同的变化进行解释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其中, 颇具影响的解释之一是全球化假设。然而, 关于全球化到底如何作用于国家认同, 不同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有学者认为, 全球化将人们混置于不同制度、文化、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中, 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 从较狭窄、较亲近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 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开始失去分量 (亨廷顿, 2010: 11-13)。也有学者强调, 全球化无法提供“集体信仰、尊严和希望” (Smith, 1995: 60)。另有学者指出, 在全球化时代, 延续国民身份是组织公共生活的需要, 全球化使归属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而国家认同则安放了人们的归属感 (Calhoun, 2007)。

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全球化的重要工具, 但它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 技术决定论认为, 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和去地域化的特点, 它在促进全球传播和塑造全球意识的过程中, 逐渐削弱了国家认同 (Eriksen, 2007; Soffer, 2013)。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还带来了文化的个体化和碎片化, 同时也使得政府不再拥有对公民实施文化控制的专属能力 (Poster, 1999)。另一方面, 技术建构论认为, 互联网促进交流的能力受社会经济结构限制 (Curran, 2012)。进一步讲, 互联网可能会阻碍某些行动, 也可能会促进某些行动。通过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和引导, 互联网可以成为提升民众国家认同的工具。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是解释人们价值观念变迁的另一重要理论视角。该理论指出,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社会的核心工程将从“在稳态经济下生存”“最大化经济增长”转向“最大化主观幸福感”, 个人价值观亦从强调传统宗教、社区规范和成就动机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 2013a: 84)。这是因为人们往往看重那些稀缺的事物, 只有在某些东西供应相对不足的时候, 人们才会在主观上给予它们最高的价值 (英格尔哈特, 2013a: 32)。在

物质较为匮乏的时候，人们更关心物质满足、安全与秩序；而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则会寻求自由和自我表达等非物质层次的需求。

进一步而言，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秩序并保卫其人民和财产免受外部侵害”，而“后物质主义的偏好之中较少关注这些问题”（英格尔哈特，2016：301），因此人们“对既有的民族国家制度的支持发生变化，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下降”“爱国主义合法性降低”（英格尔哈特，2016：4-5）。此外，人们的基本价值观通常形成于儿童及青少年阶段，且在整个成年期基本保持稳定。个体的价值观念优先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社会经济状况，即“早期的经历而非当前的处境”（英格尔哈特，2016：81）。因此，价值观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伴随新老年龄群体在人口中的迭代更替，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或许会越来越多，社会根本价值观亦将逐步发生转变。

有证据表明，无论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民众的基本价值观普遍出现了转变，且这种转变和人口的代际更替过程密切相关。虽然这种转变是渐进的，但却有着强劲的长期态势（英格尔哈特，2013a：3）。或许正因为如此，世代成为了国家认同研究普遍关注的人口特征。不过，在对国家认同的世代差异的理论解释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和国家绩效论存在一定的冲突。国家绩效论强调，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对它的忠诚度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开明的统治者调整其国民的经济活动……使自己关注于其国民的福利”，“对他来说，热爱祖国是他得到好处的结果”（凯杜里，2002：2-4）。只有当国民感受到国家对自己有用时，结实的连接纽带才能建立（张静，2019：65-66），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的失效（王卓君、何华玲，2013）。

以上是解释国家认同变迁的代表性理论。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对国家认同变迁的预测既有不确定性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我们将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及已有的经验研究，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与世代效应假设。

（二）中国社会转型与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和世代效应

年龄、时期与世代是社会变迁研究关注的三个与时间相关的维度。本文的分析对象为青年群体，年龄差异不大，所以重点讨论时期与世代效应。

时期效应反映的是外生的社会条件变迁对所有成员的影响，世代效应体现的是生命早期的社会历史事件与环境对特定群体的影响。

如何理解转型期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和世代效应？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综合效能论”，即青年国家认同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一理论观点进行具体阐述，并提出我们关于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研究假设。

1. 时期效应

围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上升论、停滞论和下降论等相互矛盾的观点（Huang et al., 2023; Tang & Darr, 2012）。如上文所述，这种不一致的看法在青年群体中同样存在。本文认为，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家认同需要进行分期讨论。根据已有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至少经历了两次明显的波动。第一次波动表现为国家认同的下降，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主要受全球化与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影响。第二次波动表现为国家认同的上升，始于 2012 年，主要受国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

图 1 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状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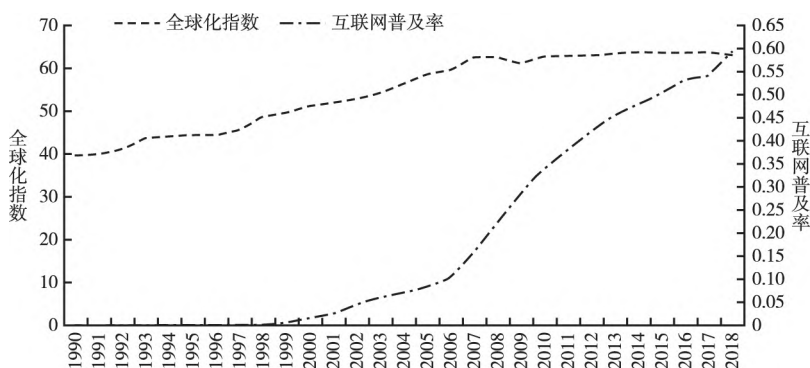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全球化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的全球化指数和互联网普及率就一直呈增长之势，互联网普及率在 2006 年后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在全球化和互

^① 全球化指数根据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发布的数据整理而来，取值范围是 1~100。互联网普及率由世界银行计算的每百人中互联网使用者的比例，取值范围是 0~1。

联网快速普及的过程中，青年的国家认同更容易受到影响。因为青年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李春玲、刘森林，2018），并且青年始终是上网和用网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交友互动、学习交流。因此，全球化与互联网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将最先、也更为清晰地在青年群体中显现。

从理论上讲，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都具有不确定性，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时常面临‘有理说不出’‘有理传播不开’的境遇，甚至‘失语’‘失踪’‘失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曾令辉，2022）。因此，我们推测，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青年的国家认同会被弱化。换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青年的国家认同会经历一次明显的下降过程。

随着用网治网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互联网对国家认同产生的负面效应得到有效遏制。^①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2022：10）。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在快速攀升，但互联网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明显减弱，甚至可能发生逆转。此外，青年以独有的方式在公开场合和互联网上表达爱国情感，成为网内网外、线上线下弘扬正能量的生力军（陈晓冉等，2016）。进一步而言，互联网在较大程度上扮演着“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提升民众爱国情感的角色。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在这一时期呈上升趋势。有两项研究初步证明了这一判断（陈国华，2023；Huang et al., 2023）。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时期效应假设。

假设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即1990—2018年的青年国家认同具有“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

2. 世代效应

上文已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是解释价值观变迁，包括国家认同变化的重要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与物质满足会带来价

^① 董向慧，2021，《推动互联网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最大增量”》，9月30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1-09/30/nw.D110000gmrb_20210930_5-1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6月4日。

值的变化，人们越来越看重非物质层次的需求。在中国情境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初期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等阶段，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生活日益得到改善。1990—2018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501跃升到0.758，增长了近51.1%，并成为自联合国引入人类发展指数以来，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①中国已经从强调解决温饱的“生存型社会”向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自我实现的“发展型社会”转变（周国富，2010）。相对而言，成长于改革开放前的群体曾经历物质匮乏时期，经济不安全感较强；而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群体物质环境较好，生活更为富足并更有保障。但是，这种成长环境的差异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不同世代群体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还存在较大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在中国产生和发展，这与其他国家存在相似性。特别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成长的“80后”和充分享受经济高速增长“90后”，显示出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李春玲，2015）。有学者认为“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魏莉莉，2016），在“90后”中已形成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要内涵的新价值观（邓希泉，2016）。另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具有明显的代际递增特征与趋势（李艳霞，2017）。与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在话语体系、社会交往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后物质主义趋向（池上新等，2023）。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相对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也会相对较低。本文提出如下的世代效应假设。

假设2.1：总体而言，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随世代的年轻化而下降。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强调自由文化的传统，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尊重权威、重视统一与团结、强调和谐与稳定，这种文化特殊性将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高海燕等，2022）。此外，价值观通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但中国人的价值

^① 陈尚文、程是颖，2019，《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取得巨大进步》，12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1210/c1002-3149780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8日。

观仍处于物质主义阶段，依然更重视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英格尔哈特，2013b）。多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有研究指出，政府治理绩效对青年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杨慧青、彭国胜，2023）。另有研究表明，与个体特征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相比，国家实力感知对青年国家认同的促进作用最为稳定（陈国华，2023）。一项比较研究显示，中美两国民众国家自豪感的来源和内容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人国家自豪感的来源主要是观念上的，而中国人国家自豪感的来源则往往是物质上的（Ni et al., 2024）。也有研究指出综合国力提升是民族意识复苏和高涨的重要动因（房宁，2008），绩效合法性是当代中国国家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来源（赵鼎新，2016）。倘若如此，我们可以推论，越年轻的世代，他们成长时期的综合国力越强、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国家认同也越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世代效应竞争假设。

假设 2.2：总体而言，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随世代的年轻化而上升。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WVS是一项旨在研究全球社会与价值观变迁的国际调查项目。WVS从1980年开始，该项目覆盖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自1990年加入该项目，至今共参与了其中的六轮调查，总时间跨度为29年。由于各期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并涵盖同样的调查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对国家认同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其变迁趋势。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18~35岁的样本为分析对象，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后，最终总样本量为3059人。

（二）变量测量

国家认同是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认同是公民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一国家的感受（Huddy & Khatib，2007）。在经验研究中，一个普遍的做法是用国家自豪感测量国家认同（陆屹洲，2023；徐延辉、赖东鹏，2024；Fabrykant & Magun，2019）。本文遵循这一

方式，通过国家自豪感测量国家认同。

国家自豪感是多个重要的跨国性学术调查普遍采用的国家认同测量指标。除 WVS 外，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和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 ISSP）也采用了这一指标。不同的是，ISSP 同时询问了一般性国家自豪感与特定领域的国家自豪感，而欧洲晴雨表调查和 WVS 只询问了一般性国家自豪感。在 WVS 中，关于国家自豪感的问题表述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骄傲？”答案选项包括“1. 非常骄傲，2. 骄傲，3. 不太骄傲，4. 根本不骄傲”。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对各选项进行逆向赋值，数值越大，表示国家认同越强。

时期与世代是本文关注的两个趋势变量。其中，时期变量由 WVS 在中国进行调查时的年份构成，分别是 1990 年、1995 年、2001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8 年。在世代划分方面，首先，可以参考既有研究（李春玲，2020）并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大致划分为：上山下乡的一代（出生于 1950—1959 年），改革开放的一代（出生于 1960—1979 年），新生代（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后两个世代。其次，为了对不同世代进行更细致的比较，每 5 年划分为一个世代。最后，由于出生于 1995 年及之后的样本量比较少，所以将 1995—2000 年出生的样本归为一组，最终产生了 9 个世代。

本文控制了受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性别、婚姻状态和就业状态等个体特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阶层均包括三个序次。性别、婚姻状态和就业状态为虚拟变量，编码中 1 表示男性、已婚和就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 1。

表 1 中，连续变量和虚拟变量报告的统计值为均值，类别变量报告的统计值为百分比。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别变量	百分比	类别变量	百分比
时期		年龄	
1990 年	14.09	18 ~ 24 岁	20.99
1995 年	20.30	25 ~ 29 岁	25.56
2001 年	9.09	30 ~ 34 岁	31.81

续表 1

类别变量	百分比	类别变量	百分比
2007 年	12. 23	35 岁	21. 64
2012 年	18. 96	受教育程度	
2018 年	25. 33	小学及以下	19. 25
世代		中等教育	56. 69
1955—1959 年	4. 02	大学及以上	24. 06
1960—1964 年	10. 46	收入	
1965—1969 年	12. 29	低收入	30. 92
1970—1974 年	13. 31	中等收入	38. 97
1975—1979 年	11. 67	高收入	30. 11
1980—1984 年	12. 85	社会阶层	
1985—1989 年	17. 65	下层	40. 93
1990—1994 年	10. 23	中层	47. 47
1995—2000 年	7. 52	上层	11. 60
连续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家认同	3. 19 (0. 71)	1	4
性别 (男性 = 1)	0. 48 (0. 50)	0	1
婚姻状态 (已婚 = 1)	0. 64 (0. 48)	0	1
就业状态 (就业 = 1)	0. 77 (0. 42)	0	1

注: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三) 分析方法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识别出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与世代效应,但考虑到年龄因素对时期与世代效应估计可能存在的影响,所以选择 APC 模型进行分析。关于 APC 模型的求解方法,近年来使用比较广泛的是 HAPC 和 IE 方法,两者均可以解决年龄、时期、世代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时期 = 年龄 + 世代)。相较于 HAPC 方法,IE 方法对数据结构的要求比较苛刻,但却具有最小样本方差,可以生成更为精确的估计结果,也具备更

好的统计效力（高海燕等，2022；李晓光、郭小弦，2022；Yang & Land，2013）。因此，本文将主要应用 IE 方法进行分析，同时也将借助 HAPC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分析结果

表 2 呈现了使用 IE 方法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1 只包含时期、世代与年龄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

表 2 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和世代效应（IE 方法）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时期				
1990 年	-0.060 [*]	0.029	-0.042	0.033
1995 年	0.175 ^{***}	0.030	0.175 ^{***}	0.031
2001 年	-0.062	0.040	-0.066	0.042
2007 年	-0.131 ^{***}	0.035	-0.112 ^{**}	0.035
2012 年	-0.068 [*]	0.028	-0.081 ^{**}	0.029
2018 年	0.146 ^{***}	0.033	0.126 ^{***}	0.033
世代				
1955—1959 年	0.132 ^{**}	0.051	0.133 [*]	0.052
1960—1964 年	-0.134 ^{***}	0.038	-0.144 ^{***}	0.038
1965—1969 年	-0.024	0.040	-0.008	0.040
1970—1974 年	-0.023	0.039	-0.021	0.038
1975—1979 年	-0.019	0.040	-0.020	0.040
1980—1984 年	0.055	0.036	0.034	0.036
1985—1989 年	0.003	0.030	-0.003	0.030
1990—1994 年	-0.046	0.034	-0.047	0.035
1995—2000 年	0.056	0.059	0.076	0.059
年龄				
18~24 岁	0.068 [*]	0.029	0.078 [*]	0.035
25~29 岁	0.001	0.024	-0.008	0.024

续表 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30 ~ 34 岁	-0.031	0.024	-0.030	0.026
35 岁	-0.038	0.025	-0.041	0.027
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中等教育	—	—	0.218***	0.035
大学及以上	—	—	0.208***	0.044
收入 (参照组: 低收入)				
中等收入	—	—	-0.074*	0.034
高收入	—	—	-0.035	0.039
社会阶层 (参照组: 下层)				
中层	—	—	0.072*	0.029
上层	—	—	0.031	0.048
性别	—	—	-0.027	0.026
婚姻状态	—	—	0.028	0.036
就业状态	—	—	0.054	0.034
截距	3.170***	0.095	2.956***	0.052
N	3059		3059	
Log likelihood	-3255.051		-3229.86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一) 时期效应

图 2 呈现了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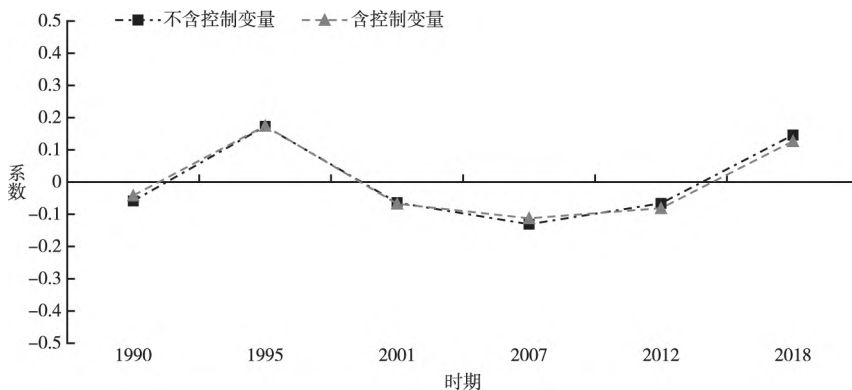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效应 (IE 方法)

如上文所述，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青年国家认同经历了一次下行波动。结合图1和图2，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的全球化指数和互联网普及率都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则开始下降。从表2中模型2的结果可知，1995年，中国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显著为正，而2001年、2007年、2012年的系数都为负。因此，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即青年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在1990—1995年显著上升，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后，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张卓元，2018），以及中共中央明确以青少年群体为重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范晓东、韩庆，2020）。

2012年后，中国的全球化指数略有下降（详见图1）。此时，尽管互联网普及率仍在快速提高，但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卓有成效，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开始明显提升。2018年，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显著为正。假设1得到进一步验证，即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在2012年后显著上升，并且在1990—2018年其国家认同具有“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这种时期变化模式表明，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并不必然削弱国家认同，民众对国家的积极情感能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得到提升。

（二）世代效应

图3呈现了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变迁的世代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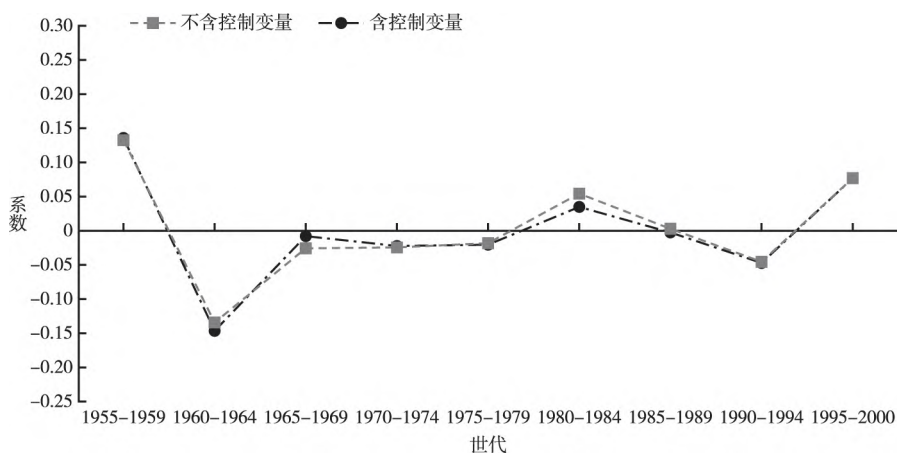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世代效应 (IE方法)

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改革开放的一代（出生于1960—1979年）和新生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并未随着世代的年轻化下降，而是呈现出曲折上升之势。因此，假设2.2基本得到验证。这说明虽然这两代人成长在相对经济繁荣和物质丰裕的环境下，但并未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所预测的国家认同降低的现象。

同时上述发现也表明，国家绩效论更能解释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代际差异。1985—1989年与1990—1994年这两个世代国家认同的下降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有研究指出，国家认同一般在5岁左右开始发展，15岁前后形成，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相对稳定（Barrett, 2005; Tartakovsky, 2011）。换言之，个体在5~15岁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其国家认同的基础。照此分析，这两个世代的青少年阶段多处于因减员增效改革而形成的“下岗潮”时期。据统计，1993—2004年，约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占当时城镇劳动力的38%，超1/5的家庭在收入、教育和健康等方面受到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波及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群体（梁甄桥等，2018; Giles et al., 2006; Liu & Zhao, 2014）。尽管尚未发现有研究专门探讨这次“下岗潮”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但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2还显示，1955—1959年世代，即上山下乡一代国家认同显著更高。这看起来与上文论述的其他世代的国家认同逻辑相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一世代成长的社会历史阶段，国家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并非国家绩效（赵鼎新，2016）。换言之，改革开放一代和新生代国家认同形成的主要机制与之前的世代有所不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应用HAPC方法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进行估计，相关结果见图4和图5。^①

就时期效应而言，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国家认同在1990—2018年都经历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过程，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在2012年后明显上升。这一结果与IE方法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就世代效应而言，改革开放一代和新生代的国家认同都没有随着世代的年轻化下降，而是曲折上升。

^①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出HAPC方法的详细估计结果。如需要，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这也与 IE 方法的估计结果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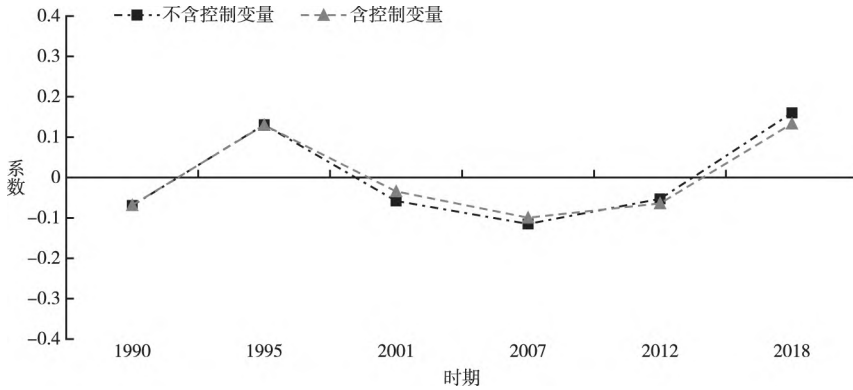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时期效应 (HAPC 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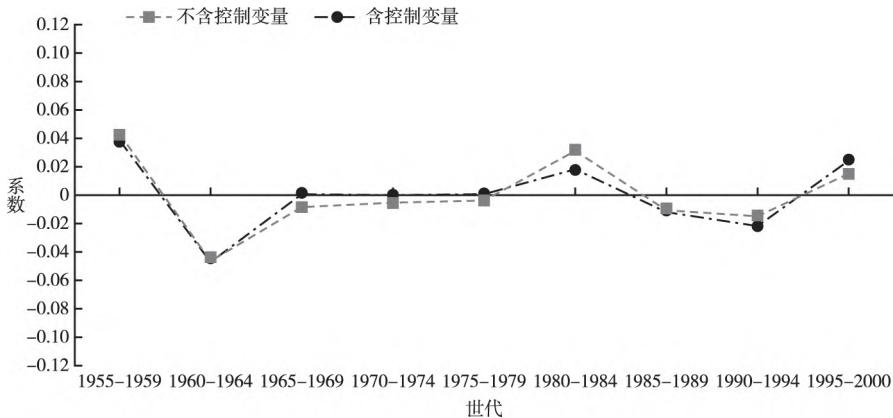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世代效应 (HAPC 方法)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横跨近三十年的 WVS 数据，本文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时期与世代变迁趋势，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在 1990—2018 年经历了明显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1995 年以后，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开始下降，2007 年和 2012 年显著更低，之后则开始上

升。2018年，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显著更高。第二，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并没有随着世代的年轻化而下降。对于改革开放的一代和新生代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表现出曲折上升之势。第三，转型期中国青年国家认同变迁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并不必然削弱国家认同。

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和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研究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时也说明对青年国家认同的分析、比较和讨论应特别注意区分时期。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一代和新生代青年国家认同并没有随着世代的年轻化而下降，这说明国家绩效论更能解释青年国家认同的世代变迁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青年群体中还不明显，也可能是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发展道路等的影响，使后发国家青年发展模式和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包蕾萍，2019；池上新等，2023）。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此外，网络媒介可以成为提升青年群体对国家积极情感的途径与工具。有效的网络空间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化解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冲击，使青年的国家认同保持稳定。

从本文的结果来看，中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2012年后，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显著提升；且自“60后”起，国家认同总体上就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另一方面，这种演变趋势背后反映的是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绩效依赖性与强物质性。这种基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认同内含自我破坏机制，民众的要求会越来越超过国家提供绩效的能力，越来越难以满足，从而影响国家认同。对于老一辈而言，可能因为记得过去的苦难，所以比较容易满足；而青年则更多把今天的美好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容易产生不满（赵鼎新，2016）。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偏弱的复杂环境，要特别关注青年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一是由于样本量限制，未能对青年国家认同变迁的社会群体差异进行分析和探讨。二是受制于WVS的测量，只考察了一般性国家自豪感的变迁趋势，未能讨论特定领域的国家自豪感变迁。三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综合效能论”的分析和检验并非因果推论。随着相关调查数据的丰富，未来研究可以就其中的因果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尝试厘清多因素影响的强弱与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 包蕾萍, 2019, 《深度现代化: 80后90后群体的价值冲突与认同》, 《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陈国华, 2023, 《近十年来青年的国家实力感知与国家认同变迁——基于CSS2013和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陈晓冉、潘宇峰、祝华新, 2016, 《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主编《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池上新、石耀东、黄继朝, 2023,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社会》第5期。
- 邓希泉, 2016, 《“90后”新价值观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第9期。
- 范晓东、韩庆, 2020, 《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基本规律》,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7期。
- 房宁, 2008, 《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 潘维、玛雅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高海燕、王鹏、谭康荣, 2022, 《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亨廷顿, 塞缪尔, 2010, 《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凯杜里, 埃里, 2002, 《民族主义》, 张明明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崇富, 2013,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李春玲, 2015, 《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 ——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 《河北学刊》第3期。
- , 2020, 《代际社会学: 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李春玲、刘森林, 2018, 《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晓光、郭小弦, 2022, 《个体社会资本在下降吗?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李艳霞, 2017,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 梁甄桥、李志、丁从明, 2018, 《国有企业下岗潮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 刘佳静、张兵娟、李彦龙, 2023, 《当代青年的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 群体差异与影响机制》, 《当代传播》第4期。
- 刘森林, 2017, 《当代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科学版)》第2期。
- 陆屹洲, 2023, 《当代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历史、现实与启示——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拉丁美洲研究》第4期。
- 吕催芳, 2021, 《大学场域与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基于学校生活满意度和多元文化理念的中介作用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第2期。
- 吕芳, 2010, 《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 《政治学研究》第4期。
- 王卓君、何华玲, 2013,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危机与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魏莉莉, 2016, 《青年群体的代际价值观转变: 基于90后与80后的比较》, 《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徐延辉、赖东鹏, 2024, 《转型中国的国家认同变迁趋势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杨慧青、彭国胜, 2023, 《政府治理绩效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英格尔哈特, 罗纳德, 2013a,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严挺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3b, 《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 《人民论坛》第27期。
- , 2016, 《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 叶娟丽、韩瑞波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曾令辉, 2022, 《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成就与根本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
- 张静, 2019, 《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卓元, 2018, 《中国经济四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回顾》, 《经济与管理研究》第3期。
- 赵鼎新, 2016,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学术月刊》第8期。
- 周国富, 2010, 《试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 《浙江社会科学》第8期。
- Barrett, Martyn 2005,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Ding, Sharon & Karen Littleton (eds.), *Children's 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Calhoun, Craig 2007, *Nations Matter: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 London: Routledge.
- Curran, James 2012, "Reinterpreting the Internet." In Curran, James, Natalie Fenton & Des Freedman (eds.),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 Eriksen, Thomas Hylland 2007,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3(1).
- Fabrykant, Marharyta & Vladimir Magun 2019, "Dynamics of National Pride Attitudes in Post-

- Soviet Russia ,1996 – 2015. ” *Nationalities Papers* 47(1) .
- Giles , John , Albert Park & Fang Cai 2006, “How h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fected China’ s Urban Workers?” *The China Quarterly* 185.
- Huang ,Zhongbin ,Zesen Yang & Tianguang Meng 2023, “National Identity of Locality: The State , Patriotism , and Nationalism in Cyber China. ”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8(1) .
- Huddy , Leonie & Nadia Khatib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 National Identity ,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 .
- Liu , Hong & Zhong Zhao 2014, “Parental Job Loss and Children’ s Health: Ten Years after the Massive Layoff of the SOEs’ Workers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31.
- Ni , Jiaqian , Mengqiao Wang & Kai Quek 2024, “The Sources of National Prid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30(4) .
- Poster , Mark 1999,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Znternational Joumcol* 15(4) .
- Smith , Anthony 1995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offer , Oren 2013, “The Internet and National Solidarit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 *Communication Theory* 23(1) .
- Tang , Wenfang & Benjamin Darr 2012,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7) .
- Tartakovsky , Eugene 2011, “National Identity of High-School Adolescents in an Era of Socio-economic Change: Russia and Ukraine in the Post-Perestroika Period.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2) .
- Yang , Yang & Kenneth C. Land 2013 ,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 Methods ,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Boca Raton: Taylor & Froncis Group.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权小娟、郑明珠、宋希斌)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缪晓雷)

责任编辑: 王金水

Project-Based and Role-Set Interaction Mechanism

..... *Zhao Jixiang & Zhu Jiangan* (154)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volunteering, studies have recommended service learning as an optimization strategy, but has not thoroughly analyzed its specific optimization path.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key to optimizing volunteering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project-based and role-set, where the former provides a clear action framework for volunteering, and enables multi-role experiences through task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latter consciously disassembles volunteers into learners, researchers, designers, actors and reflectors, which enriches the students' project experiences, improves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timulates the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ing.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ing Project-Based Service Learning Role-Set Interaction Mechanism

Changing Trends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hinese Youth (1990—2018)

..... *Quan Xiaojuan, Zheng Mingzhu, Song Xibin & Miao Xiaolei* (174)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 trends of Chinese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1990s. This study finds that from 1990 - 2018, youth national identity experienced a decline followed by a rise,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fter 2012.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ohort and the new cohort has not shown a significant decline but rather a zigzagging upward tre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do not inevitably lead to a decline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explains the cohort differences in youth national identity better than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theory.

Keywords: Patriotism National Prid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Globalization Internet